

越文化研究丛书 王建华 主编

孙伏园评传

吕晓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越文化研究丛书 王建华 主编

孙伏园评传

吕晓英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伏园评传 / 吕晓英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161 - 0299 - 2

I . ①孙… II . ①吕… III. ①孙伏园(1894—1966) -
评传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0211 号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大 乔

责任校对 王俊超

封面设计 子 时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64040843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 - 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89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丛书》

序

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丛书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课题编号09JDYW01ZD）成果。

世纪之交，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了浙江省不仅要建成经济强省，而且要建设成文化大省的重要决策，大大地推进了浙江文化的研究，也激活和浓化了浙江的学术空气。社会发展必然推动文化的进步，但文化的精进反过来又会推动社会的发展。这种相辅相成的关联性，自然要求浙江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获得全面进步后尤其要重视文化建设。多年来，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浙江省文化建设的一个亮点，不仅是浙江省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而且也是浙江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然而，文化研究有一个基本的抓手，就是作为社会主体和文化主体的人。因为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又是社会、文化的载体，文化演进和社会发展都是由人主导的。因此，研究文化就是要研究主体的人所创造和彰显的社会文化的历史形态和内在品格，为今后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服务。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申报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科规划重大课题《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2009年获得了立项资助。

从全省范围讲，浙江（越）文化研究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萌芽，到20世纪末期揭幕，至今已经着手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浙江（越）文化的史论研究；二是浙江（越）文化名人传记的研究、撰写。前者以宏观的理论探讨见长，奠定了浙江（越）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后者从文化主体的个体出发进行微观的透视，呈现浙江（越）文化的主体状态。这两种视角构建了浙江（越）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浙江（越）文化研究的基础。

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基地前几年组织力量重点研究了“越文化通



论”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推出了一批成果，就是立足于史论，旨在为今后的越文化研究奠定基础的。然而，越文化研究停留在这里是不够的。一是我们的研究必须从历史走向现代，要服务于当代，启示将来，因此开展现代越文化研究显得十分重要；二是文化不只是抽象的、概括的、普遍意义的，也是具体的、鲜活的、个性化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一方面要将理论的概括融入到鲜活的个体和具体的形态中去，另一方面又要从个体中把握其普遍的意蕴指向，同时还必须把握古往今来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超越的情形。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特征与基本面貌。一种先进的文化姿态总是既不会忘却历史，又能着眼于现实，放眼于未来；而一种有生机和活力的文化，则不是着眼于传统，而是立足于现代。从本质上说，文化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从历史中把握内在精神的现代基质，探寻现实人生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路向。所以，文化研究必须具有三种眼光：过去—现在—将来；必须抓住三个基点：人—时代特征—自然环境；必须把握三种内涵：传统—现代—未来。而一种文化如何从传统走向未来，现代的情形则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把握现代的蜕变，是推进文化研究由注重历史走向着眼未来的一条必由之路。

越中自古以来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名人辈出。在近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越中诞生了蔡东藩（1877—1945）、刘大白（1880—1932）、鲁迅（1881—1936）、许寿裳（1883—1948）、周作人（1885—1967）、夏丏尊（1886—1946）、孙伏园（1894—1966）、胡愈之（1896—1986）、许钦文（1897—1984）、谷剑尘（1897—1976）、孙福熙（1898—1962）、章锡琛（1889—1969）、魏金枝（1900—1972）、孙大雨（1905—1997）、姚蓬子（1905—1969）、孙席珍（1906—1984）、吴似鸿（1907—1988）、陶亢德（1908—1983）、柯灵（1909—2000）、徐懋庸（1910—1977）、陈梦家（1911—1966）、金近（1915—1989）、谷斯范（1916—1999）等一大批著名作家。他们有的是现代文学大师，有的是“五四”白话新诗文的开创者和代表诗人，有的是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有的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有的是上海“孤岛”时期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有的是白马湖派的代表人物，有的是湖畔诗社的重要诗人，有的是著名的戏剧家，有的是“左翼”文学的著名作家，有的是鲁迅杂文的继承人，有的是抗战文学的代表作家，有的是近现代通俗演义小说重要的开创者……他们贯注着越文化的血脉，又



创造了鲜活的现代越文化成果，显现了越文化的现代形态与内在特征，是越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的活的文化标本，反映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越地人民的精神历程及其所取得的历史文化成就。

因为以往的研究关注历史的比较多，而关注现代和当代的比较少；关注文化精英和高层的较多，关注大众形态和普通性的很少，所以，除鲁迅和周作人之外，学术界对上述越中作家重视不够，大都没有被纳入学术界系统研究的视野之中。而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发掘其精神资源，关注其现代文化成就的尤其少，审视其创造的独特文化形态，显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于他们在浙江（越）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由封建走向民主的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精神流变和思想引领的生动状态更疏于探究。因此，开展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是对浙江（越）文化研究的一种补充、深化和拓展，意义重大。一、展示浙江文化的现代成就，展现浙江文化的先进性，弘扬浙江文化的现代精神，为正确认识从晚清到现代浙江（越）文化的历史特征提供一个切入口，为浙江（越）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些思想启示；二、开拓浙江（越）文化的研究领域，有利于建构历史形态研究——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研究——现代越文化研究的完整研究体系，推动浙江（越）文化的全面研究，推进浙江省文化工程的研究进程，为区域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途径；三、为正确认识近代知识分子如何转变为现代文化精英提供一种理论指导，为现代史书写提供参考；四、填补上述作家没有整体研究的空白，深化和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为文学欣赏提供指导和启示；五、为人物研究和评传写作提供一种学术借鉴与参照；六、镜照世俗社会，启示现实人生，引导个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社会进步。

因此，我们准备分期分批地对上述知名作家展开研究。最初的设想是于2005年提出的，2007年着手准备，2008年开始启动，2009年开始了全面的实质性研究，到现在已经有几年了。目前选取了学术界关注比较少，整体研究比较薄弱，甚至是还没有作过整体研究的10位作家作为第一批研究对象，组成了《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重大课题。这些作家是蔡东藩、刘大白、许寿裳、夏丏尊、孙伏园、胡愈之、魏金枝、孙大雨、徐懋庸、陈梦家。我们从校内外选取了有一定研究基础和实力的教师作为课题组成员，采取统一规划、目标一致、分项包干、责任自负的方式，展开



研究。我们的想法是，这一批作家研究完成后，重新申报项目对第二批、第三批作家进行研究。至于为何没有将鲁迅、周作人两位大师列入第一批研究对象，是因为学术界对他们已经有很充分的研究，各种研究成果很多，就是从浙江（越）文化视角去研究他们的成果也不少，这是我们要特别说明的。

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些越中现代著名作家的研究，发掘浙江（越）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是如何将时代要求内化为文化精进者的主体追求，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的深层原因，从而把握浙江（越）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的精神脉络，探求浙江（越）文化的现代精神底蕴，构建越地现代人类学的理想图景。其特点在于：一、着眼于从近代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抓住人这个主体，以系列研究来审视浙江（越）文化从封建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的演变轨迹，打破以往研究中宏观宽泛的研究态势，改变割裂式的个别研究，既呈现浙江（越）文化的个体活性，又彰显浙江（越）文化的历史形态，避免以偏赅全、人为设定的局限与不足。二、文化既是一种历史形态，又是一种现实形态，还是一种从历史到现实的过渡形态，但文化研究始终是为现实形态的建构服务的，要着眼于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打破庸俗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惯性思维模式，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从社会转型的动态文化大背景中去进行整体研究，揭示社会的剧变对个体人生的影响，通过全面把握社会转型中不同个体的生命旅程、思想性格、人生业绩和创作成就，来把握浙江（越）文化的现代形态，改变以往以静态的文本解读和阐释的简单化方式，凸显文化的立体感和整体性。三、文学是文化的一种主要构成要素，文化灌注在文学之中。因此，从各个研究对象的生命发展历程中来把握他们的文学创作，审视它们在现代浙江（越）文化建构中应有的文化、艺术和思想价值，把握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意义，彰显浙江（越）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力，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在这里，个体与整体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联系，就成为了我们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原则，并重视将这些作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场域中展开研究。

在研究中，我们强调融社会批评与主体剖析于一体，理清各个研究对象的生命旅程和思想发展脉络，突出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将事业（仕



途)、爱情和交游三线交织，全面地展现其悲喜沉浮的人生，揭示其人生和创作取向的主客体成因，立体地展现其真实形象，彰显其现代的精神特征和越文化的现代品格。同时，我们又注重分析和把握他们文学创作的特色和成就，认识他们各自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们的研究，既注重文化个体活性，又注重理论概括；既注重历史传统的把握，又注重对传统与现代的融通、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并以社会学、文化哲学和生命哲学为指导，突出原初性研究特征，挖掘越文化渊源；且以文本研读、田野调查和人物访谈为路径，立足于社会转型的背景来审视他们的人生历程、思想情感和文化心理，透视其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以及价值追求，进而彰显浙江(越)文化的现代精神。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注重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研究，力求比较全面而准确地对研究对象的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地位予以比较客观的评价；注重对现有研究文献和传记资料的甄别与辨正，剔除以往研究中的错漏与偏失，力求还研究对象以本来面目；注重从特定时空背景中去审视研究对象主体人生的独特状态，力求对其人生和思想历程作出比较科学而合理的阐释。因此，我们一方面高度重视搜集越文化背景和历史资料，以及各研究对象散落的文学作品、文献资料和生平事迹，把准其精血气；另一方面又重视对研究对象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的考察，重视访问其后人及其友人的后代，重视与相关的研究专家交流，以完善研究工作。

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再三讨论了各子课题的研究方案，又审定了各专著的写作纲要，有的经过了几次的讨论修改以使整个课题的研究成果保持面貌的基本一致，而又各具个性和特色。在这套成果丛书出版之前，我们也随机性地选择部分书稿予以审阅，每部书稿都经过了三四次的修改。然而，由于研究对象几乎都是博古通今、中西交融的鲜活的文化个体，牵涉的学科领域很广，触及社会与人生的问题很深，文化内涵很丰富，对研究者的素养形成了很大的挑战，赋予了研究工作本身较大的难度；加上课题组成员都担负着繁重的教学工作，有的还担负着繁重的管理工作，精力不够集中，时间比较紧张；尤其是我们水平有限，并且对人物评传的撰写缺乏经验，因此，研究工作难免存在一些着粗疏和不足，我们敬祈读者批评指正。同时，由于课题组成员从事研究的经验和实力本身存在差异，因此，



虽然我们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大都十分认真和负责，但实际上这套丛书的质量很难做到整齐划一，这是我们尤其感到不安并要恳请读者谅解的。我们必须告白的是，我们所做的仅仅是抛砖引玉的工作。

在研究进入尾声，成果即将付梓之际，作为课题主持人，我们首先要感谢全体课题组成员几年来的密切协作与艰苦工作，使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得以按时完成。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领导部门以及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基地的大力支持。因为有了这些支持，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才由设想变为了现实，这套成果丛书才得以顺利出版。而且我们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宫京蕾编辑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此外，对一直以来给我们的研究工作以热情帮助和关心的许许多多好心人，我们一并致以谢意。

课题负责人：王建华 刘家思

前　　言

孙伏园（1894—1966），浙江绍兴人，作家，编辑家，文化名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均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至今，没有完整记述孙伏园的生平活动，并结合其创作进行全面评述研究的“评传”，这意味着在孙伏园研究上尚存一个大的空白领域，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孙伏园的人生经历、思想发展与时代发展、革命运动之间存在着主客观交互影响的血肉相连的紧密联系。在他身上，有许多很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情统一在一起，这是一个奇迹，他单纯而又复杂，豪情而又节制，激情而又严谨，乐观而又悲悯，率真而又谨慎，能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而又不世故，浪漫的文人气质与深刻的现实洞察力有机相融。要做到这一切是很不容易的，孙伏园却很自然而轻松地做到了。孙伏园为文很高妙，为人也是如此，他有着无限的生活智慧。

1894年12月24日孙伏园出生于绍兴城内渔化桥河沿，祖籍绍兴嘉会（今绍兴齐贤镇），原名福源。1918年进北京大学读书，更名伏园。1921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他辞去北大讲师之职，出任《晨报》专职编辑。同年10月12日，接替李大钊，主编《晨报》第七版“文艺栏”，并将该栏改为四版单张，定名为《晨报副镌》。1924年10月，孙伏园辞去《晨报副镌》编辑职务，应《京报》总编辑邵飘萍之邀，任《京报副刊》主编。1926年4月24日，《京报》被查封。同年8月，孙伏园到厦门大学任厦门大学国学院编辑部干事。12月，赴广州，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兼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1927年3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汉口创刊，孙伏园应邀任《中央日报》“中央副刊”总编辑。1927年9月1日，《中央日报》“中央副刊”停刊，孙伏园与三弟孙福熙共同在



上海创办嘤嘤书屋。1927年12月5日，《贡献》旬刊创刊（第五卷起改为月刊），孙伏园出任主编。《贡献》于1929年3月出至第五卷第三期时终刊。孙伏园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在巴黎大学专修文学，并从事散文创作。1931年5月，自巴黎回国，应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领导人晏阳初之邀，到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任平民文学部主任，编辑平民读物、《农民报》及平民学校课本《千字课》等。1937年6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部搬迁至长沙，孙伏园随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迁至长沙。1938年初，湖南省衡山实验县成立，孙伏园出任衡山实验县县长。1939初，孙伏园辞去衡山实验县县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安排孙伏园赴贵州定番县乡政学院工作。1940年底，孙伏园到重庆，执教于重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并受聘重庆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和设计委员会委员。1940年冬天，重庆《中央日报》改组，孙伏园应总编辑陈博生之邀到《中央日报》，以主笔的名义主编副刊。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在《中央日报》副刊上登载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孙伏园因此被撤销《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副刊”主编职务。之后，借重庆《时事新报》改组之机，孙伏园进入《时事新报》任主笔，实际上在编辑部负总责。1943年上半年，在主笔《时事新报》不到一年后，即退出《时事新报》。和刘尊棋、詹辱生等组建中外出版社，从事出版工作，出版《文汇周报》，孙伏园任该刊主编。同时，1941年1月至1945年8月，孙伏园还任重庆士兵月刊社社长，负责编辑出版《士兵半月刊》。1945年8月，任成都齐鲁大学中文系主任。后应成都华西大学文学院汪德亮院长之聘在华西大学教书，一直工作到1949年，历时四年。1947年9月起，在华西大学教书的同时，又在“中西文化研究所”和铭贤学院兼职。同时，1946年，应成都《新民报》总编辑关白晖之邀任该报主笔兼副刊编辑，直至1949年上半年《新民报》被查封。1949年夏天，离开成都再赴重庆，在北碚的乡村建设学院任教授。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孙伏园应邀参加重庆市军管会召开的文教界代表座谈会，当选为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参加了人代会。1950年1月，应胡愈之之邀欣然北上，1950年2月2日，到达北京，出任出版总署图书馆馆长，全国文联增选孙伏园为全国委员会委员。1954年冬天，中风脑溢血，经抢救治疗，虽脱离危险，但因右边偏瘫，不得不在家治疗休养。仍继续担任版本图书馆馆长，坚持在家中阅读办公，锻炼用左手写字。1966年1月2日，孙伏园在北京



弘通观2号家中去世。

对于孙伏园这样一位参与过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作家，著名编辑家，文化名人，迄今为止，竟没有一本专门的研究著作问世。从当下学术界研究成果看，对孙伏园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把他作为一位副刊编辑加以解读而已，且也只是停留在对史料的复述上，至于对他的散文、杂文创作成就，他的文化实践贡献均疏于谈及，这多少是件遗憾的事。我们以“评传”形式进行孙伏园研究，通过记述孙伏园的人生历程，重点评述他的文学创作、编辑活动、文化实践，凸显出他是一位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独特贡献的作家、编辑家、文化名人，具有重构性和原创性，填补了孙伏园没有评传的空白。

我们不孤立静止地研究作家作品，更不会用程式化、概念化和简单化的方法来代替对复杂文学现象作深入的思想剖析和美学评价，我们首先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从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社会实际出发，来分析孙伏园的散文杂文创作、编辑活动、文化实践，以及他思想艺术特色的形成过程和他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成就与贡献，不仅注意到从孙伏园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研究他的思想与创作，而且注意评述形成作家思想艺术特色的主观因素。

譬如，在绍兴民间，说起有出息的家族时，常有“周家三兄弟和孙家两兄弟”之称，“周家三兄弟”指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周建人，“孙家两兄弟”指孙伏园和他的三弟孙福熙，“周家三兄弟和孙家两兄弟”之称自然是说这两个家族的后人有出息。诚然，这个说法或许不够精确科学，但确也不是毫无依据的。孙家与周家，孙伏园及他的三弟孙福熙与鲁迅、周作人既是同乡师生，也是有共同文化追求的战友，他们作为师生、同人一起参与了新文化运动，留下了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在本书中，我们对孙伏园参与其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诸多现象和事件作出了学理性的解释和评价，这可使流于语焉不详的问题得到一定的廓清。

作为一部作家评传，本书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是经纬交错的结构。以生平活动为经，以创作活动、编辑生涯、文化实践为纬，为主要内容。在记叙了生命历程后，横向展开、分头分题评述，从而使得结构、脉络和层次清晰，又相对集中而形成各自的评述中心和内容特点。其二是客观真实的风格。力求表现出作家及其创作的本来面貌，从原始材料出发，以事实为根据，避免推测和想象而导致失真，如有推测和发挥，均有“或许”



“猜想”引领，表示并不确定，以适应于对问题的重新解释和探讨，注重引用原文，并注意注明出处以备考。其三是史论结合的高度。从时代变化和创作发展的背景中，按学理深入挖掘、阐释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对文学创作、编辑活动、文化实践分别作梳理和评述。崇尚理性，有激情，不激动，不感情用事，坚持实事求是，做到不溢美、不掩丑，不拔高、不贬低，崇尚借鉴，以历史和历史人物为镜子，从历史的演变和历史人物身上，寻找多方面的有益启示。

我们相信，我们的写作不只是权作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定会留下一些启迪。再者，2011年正值孙伏园先生逝世45周年，出版《孙伏园评传》更有当下纪念意义，我们愿将《孙伏园评传》作为菲薄的祭品敬献给孙伏园先生。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故乡时光	(1)
一、快乐童年	(2)
二、兄弟手足	(4)
三、结识鲁迅	(6)
第二章 北大成才	(11)
一、负笈北上	(12)
二、新潮社骨干	(16)
三、再遇鲁迅	(22)
第三章 副刊掌门	(25)
一、主编《晨报副镌》	(25)
二、催生《阿Q正传》	(29)
三、打造新文化运动平台	(33)
四、西安之行	(42)
五、主编《京报副刊》	(49)
第四章 与文艺的一段姻缘	(62)
一、《语丝》“保姆”	(62)
二、筹划北新书局	(71)
三、杂文风调	(78)
四、《伏园游记》	(95)



第五章 南下辗转	(114)
一、离京南下	(114)
二、与鲁迅共事	(117)
三、主编《中央日报》副刊	(138)
四、《贡献》之贡献	(147)
第六章 投身平民教育	(178)
一、异质文化	(180)
二、平民文学实践	(188)
三、作家县长	(197)
第七章 往来于蓉渝间	(207)
一、登载《屈原》	(209)
二、《鲁迅先生二三事》	(213)
三、中外出版社与《文汇周报》	(221)
四、大学教师	(230)
第八章 北京岁月	(234)
一、家人团聚	(235)
二、勉力而为	(240)
三、元帅探望	(248)
四、安然离世	(253)
后记	(256)
主要参考书目	(259)
孙伏园年谱简编	(262)

第一章

故乡时光

在绍兴城区西北约 11 公里处，有一叫嘉会的小镇。传说清乾隆皇帝到江南巡视时曾到过此地。当年乾隆皇帝坐着龙舟，沿着小西江一路东来，过柯桥折而往北，先在“官墅”落脚小息，后经“待驾桥”“周驾桥”“迎驾桥”“仙驾桥”顺江而下，径直来到阳嘉隆。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后人便将“阳嘉隆”改为“阳嘉龙”，而“汇”“会”近音通假，嘉会因此得名。

嘉会今属绍兴县齐贤镇。嘉会镇上街河曲折蜿蜒如游龙，龙首在东西与南北直江相会，形成“三龙”会合状。集市沿河呈弧形分布。老街的北面为铺面。踏上一座从南街通向北街的拱式石桥，倚桥眺望，只见二层砖木楼房，木檐黛瓦下的上层，有式样不一的格子窗、雕花窗，窗户或闭或开；下层则是狭长的雨廊，雨廊内古色的铺面，曲尺形的柜台，或茶馆或酒食店或百杂摊。沿着雨廊下的石板路走去，只见茶馆里有三四人聚坐品茗，百杂摊前有行人驻足挑选土布、竹木制品和霉干菜等特产，酒食店里时时散发出浓郁的老酒香味。

当时的嘉会是“濯锦乡”，濯锦是洗涤丝绸的意思。嘉会的周边有安昌、华舍两个轻纺重镇，丝绸特多，常需洗涤，嘉会自然成了安昌、华舍两个轻纺重镇的丝绸洗涤地，所以便有“濯锦”之命名。

这个有着绍兴水乡特色的小镇除有“濯锦乡”之称外，还设有多家金银箔作坊。金银箔是绍兴特种传统工艺品，经手工千锤百打而成。1 克黄金，可打成 9.33×9.33 厘米金银箔 50 张。薄胜蝉翼，无风自飘，指触入纹。成品用于会堂宾馆、宫殿庙宇、柱梁匾牌以及文物、字画、纸扇的装饰。割成丝线，用于戏袍、高级服装和少数民族服装缀绣。金银箔作坊多父子相传。这种传统手工艺锤打技术给嘉会百姓带来了滚滚



财源。

孙伏园的祖先就生活在这个小镇上。孙伏园的曾祖父长期在安徽和河南做小官，到70岁才回来，那时，家里的人都先后在白喉病中去世，包括他的哥哥和弟弟及侄子。这样他就在叔伯兄弟门下找了一位侄孙过继给哥哥和他自己做嗣孙，这就是孙伏园的父亲。孙伏园的父亲本想读书，但考虑其祖父年事已高，且留下的财产不多，他必须及早立业。因为其岳父家有人做估衣生意，所以他也就开了个估衣铺，但因他原来是学习经营杂货的，并不熟悉估衣，所以经营不善。

大约在1893年，孙家在绍兴城内渔化桥河沿购置了宅院，举家迁入城内。这是一个具有清代建筑风格的传统绍兴台门。大门上顶有屋檐挑出，砖木结构，石板铺地，屋宇高大，天井开阔。天井即院子，绍兴人称作“明堂”。走进台门大门，一方天井便施施然地呈现在眼前。每到午后，阳光投射至天井，天井便会形成一个阳光方框。天井的功能除通风、采光，还有“四水归堂”之意，因为天井的四面是四间屋的屋面，屋面上的雨水都会淌到天井里，这叫做“肥水不落外人田”。孙家的前院后园，杂莳花木，院子很大，一年四季花香浮动。客厅是三开间的平房，客厅左边挂着四张屏，屏上的字是绍兴一个老翰林写的隶书。

1894年12月24日，孙伏园出生在这座宅院内。在孙伏园出世时，家中有曾祖父、父亲、母亲，家中的财产有占地约20间平房的房子一栋，两个菜园子，田地9亩。孙家本来就家底殷实，今日又喜添新丁，更是锦上添花。孙家给孩子取名“福源”，希望他能给家族带来源源不断的福气财气。

一、快乐童年

孩子无时无刻不在天堂，童年无需祈祷幸福，它本身就是幸福。这个名叫福源的男孩，的确有个幸福的童年，这多半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父亲。父亲精细认真，他不苟言笑，不轻许人，不随便承诺，数丈以外能辨步声，事实未发现以前能有几分先知的把握。

父亲不抽烟，他的嗜好只是栽花，他是真正爱花，不是为了消闲，更不是为了图利。他从乌石荒坳里采来红蔷薇插枝，红蔷薇第一朵花开的时候，他将花盆放在正屋左边最近的茶几上，用一条竹枝的叉，支持